

大唐开国

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唐王朝与西汉的共同特征之一，都是在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过后，重新建立起封建国家政权，各自迎来了自己的盛世。

一 隋末天下大乱

隋朝的统一天下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结束了中国社会 400 年来的分裂局面。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，于称帝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，诸如设置尚书、门下、内史三省以加强中央集权；简化地方行政机构，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、郡、县三级制，以节省国家开支，便于政令的通达；建立科举选官制度，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制；在经济上颁布均田新令，采用租调力役剥削制度 减免赋税 颁布“输积法”

卷

一

以打击豪强势力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，注重水利建设；将府兵制度推行于全国，镇压江南豪族叛乱，如此等等。这一切，使得隋朝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耕地面积扩大，粮食产量增加，全国各地粮仓中储存的粮食数量多得不可胜数。在手工业方面，著名工匠李春所设计的赵州石桥，至今仍保存完好，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。其他如纺织业、造船业，亦有很大的发展。在科学文化事业方面 诸如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、陆法言的《切韵》皆堪称一代名著。这一时期，在中央王朝同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，亦有了进一步的加强，中原与中亚地区已开辟了三条主要交通要道。总之，在隋朝统一后的短短时期内，社会经济、文化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呈现出国势强盛的局面。

另一方面，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，社会矛盾亦呈现出某种程度上激化的苗头。隋王朝的建国，是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份“入宫辅政”的方式取得的，他不大懂得安天下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。在施政方针上，他所实行的均田制度并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。他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征收，致使国家仓库中储存的粮食，据李世民后来的估计，足以供五六十年的食用。史学家马端临称：“古今称国之计富者 莫如隋”^①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当开皇十四年（公元 594 年）关中地区出现大旱灾、人民无粮可食的情况下 隋文帝表面上表示同情人民的疾苦，但不肯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而是令关中灾民到河南洛阳地区“就食”，自谋活路。在史书记载中，隋文帝是以节俭而著名的。但在事实上，他下令大兴土木，在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修造仁寿宫，工程期限紧迫，被逼死的多达几万人。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，他有时不按法律条文处理政务，晚年“喜怒

^① 《文献通考·国用考》。

不恒“用法益峻”促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。待隋炀帝继位之后，他所实行的暴政致使社会矛盾立即空前地尖锐起来。

隋文帝改立的太子杨广，于公元 604 年迫不及待地将病重的父亲杀死，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是为隋炀帝。炀帝上台后，立即向全国大批征发民工，大兴土木。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役使的民夫多达 200 万人，死者十有四五。他调动大量民力，从五岭、江南地区向北方运送奇材怪石，营建宫殿和苑囿。他在洛阳西面修建的西苑，周围 200 里，苑内宫殿无数，台观殿阁林立，工程量十分浩大。为乘船到江都游玩，他下令征调上百万的民夫开凿运河。人民为着躲避徭役，往往自己伤残自己的肢体，称为“福手”、“福足”，足见人民竟被迫害到何种悲惨的地步。特别是隋炀帝自公元 612 年至 614 年向辽东地区发起的征讨高丽的战争，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，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。

隋炀帝的征讨高丽，是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的，因而给河北、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大业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山东、河北发生大水灾，湮没 30 余个郡县。大批农民在谷价踊贵、饥馑四起的情况下，被迫离开土地，成为流民。然而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，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。这一年的十二月，邹平（今山东邹平县东北）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（今山东邹平、章丘、长山诸县交界处），举起起义的大旗。王薄自称“知世郎”，作了一首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号召人民“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”，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。贫苦农民“避征役者多归之”，起义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。

在王薄起义的号召与影响之下，平原（今山东平原县）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，占据了“负海带河、地形深阻”的豆子航（今山东惠民县境内）章南（今山东武城县东北）人孙安祖聚众数百人，占据

了高鸡泊(今山东平原县境内)清河(今河北清河县)人张金称则聚众活跃于俞县(今山东夏津县)的河渚地区。蔺县(今河北景县境内)人高士达则聚众活动在蔺县一带。

大业八年(公元612年)隋炀帝在山东、河北等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,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:陆军从涿郡出发,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。结果,在高丽军民英勇抵抗、隋军士气低沉不愿作战的情况下,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,以大败而还告终。

大业九年(公元613年),隋炀帝不顾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和第一次东征的失败,又发起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。沉重的战争负担,迫使更多逃避兵役、徭役的农民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队伍。这一年,济阴(今山东曹县)人孟海公、北海(今山东益都县)人郭方预、齐郡(今山东济南市)人孟让、河间人格谦、平原(今山东平原县)人郝孝德、渤海(今山东阳信县南)人孙宣雅等相继聚众起义。各路起义军队伍,少则数万、多则十余万人,至此反隋农民起义已形成第一次高潮。

在农民起义浪潮中,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尖锐。大业九年,当隋炀帝率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,负责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(越国公杨素之子)在黎阳(今河南浚县东南)重镇率部起兵反隋。为夺得国家政权,杨玄感提出了“为天下解倒悬之急,救黎元之命”的口号,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,形势对他十分有利。然而,杨玄感在战略上屡犯错误:从黎阳渡过黄河后攻打守备力量很强的洛阳,四五十天未能攻下,致使隋炀帝得以从辽东前线率大军返回河南洛阳;杨玄感匆忙中又率军西入关中,在隋军追击之下,连战连败,最后自杀而死。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,隋炀帝杀戮大批官员,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人人自危,农民

起义军的反隋斗争形势更为有利。

大业十年(公元 614 年),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不顾危亡在即,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。然而,农民起义军从山东、河北发展到河南、江淮、山西、关中的事实,迫使隋炀帝不得不从辽东前线草草收兵,回师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。

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,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不断,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,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大的武装:在河南,有以翟让、李密为首的瓦岗军;在山东、河北有窦建德为首的义军;在江淮有以杜伏威、辅公祐为首的义军。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,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,各地豪族和地方官员相继起兵,占据一方,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。在这种形势下,是关陇贵族中太原留守李渊的晋阳起兵,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。

二 太原留守李渊

李渊字叔德,祖籍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西北)。李世民的八世祖李暠,在西晋末年占据敦煌、酒泉为王,建立西凉国,自称凉公,是为凉武昭王。七世祖李歆时,西凉被北凉吞灭。六世祖李重耳,曾任北魏弘农太守。五世祖李熙,曾任北魏金门镇将。四世祖李天赐,为北魏幢主。曾祖李虎与李弼等八人因佐助宇文泰的政变有功,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,系北周的开国功臣,死后追封为唐国公。祖父李昞,袭封唐国公,曾任北魏安州(今湖北安陆县)总管、柱国大将军。可见,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中国的 200 年中,李氏家族一直是关陇的贵族世家。

李渊娶北周上柱国窦毅的女儿为妻，生有四男即建成、世民、元霸、元吉，在隋炀帝继位后升任将军，历任陇州、岐州、荥阳、楼烦等地的地方长官。

大业九年，当隋炀帝第二次率大军东征高丽时，李渊被派往怀远镇（今辽宁朝阳附近）督运粮草。杨玄感起兵反隋时，他的兄弟从随同东征辽东的前线逃回，李渊首先发觉后立即向炀帝报告，炀帝闻讯后立即回师平叛，并同时任命李渊为弘化郡（今甘肃庆阳县）留守，诏令他兼领关右十郡的兵力，用以抵御杨玄感进入关中的西进行动。

当时天下大乱，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日益分裂，炀帝因杨玄感起兵反叛而猜忌杀戮大臣。炀帝曾因事征召李渊议事，李渊因病未能按时拜见。李渊有个外甥王氏在炀帝后宫，炀帝向王氏询问李渊未应召入宫的原因，王氏以李渊患病答对。炀帝闻听后半信半疑，颇不满意地说道：“可得死否？”当李渊闻知炀帝对自己的猜疑和不满后，越发恐惧。为消除皇上的猜疑，李渊在向炀帝进献珍宝的同时，整日纵酒取乐，以表示自己胸无大志，没有窥视国家神器的野心。就在这一年，炀帝因猜疑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，抄斩了李浑一家 13 口人。李浑的势力与李渊不相上下，李渊怎能不整日提心吊胆，担心大祸的降临。

大业十一年四月，李渊被调任为山西、河东慰抚大使，携家眷由陕西来到山西，受命镇压山西的农民起义军。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下，李渊早就有起兵反隋的考虑，他的副使夏侯端向他指出处境险恶，劝他及早做准备，李渊表示赞同，“深然其言”^①。由于李渊的深谋远虑，他认为起兵的时机尚不成熟，表面上不得不效忠

^①《旧唐书·夏侯端传》。

炀帝。到达山西后，李渊率兵攻击龙门的以毋端儿为首的义军，“射七十发皆中 贼败去。”又攻击绛州以柴保昌为首的义军，“降其众数万人”。

大业十二年，隋炀帝命令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抵御突厥的南下进攻。当时，突厥兵强势盛，而李渊、王仁恭所拥有的兵力却不足 5000 人。在强大的敌人面前，“仁恭以兵少甚惧”，而李渊却胸有成竹地分析形势说：“我当用长策以驭之 和亲而使之 令其畏威怀惠”并提出了“今若同其所为 习其所好 彼知无利 自然不来”的策略。王仁恭赞同李渊的谋略，派“两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，随逐水草，……驰骋射猎以曜威武……如此再三，众心乃安，咸思奋击。”李渊的战略战术使突厥困惑不解 在时机成熟后 李渊下令“纵兵击而大破之 获其特勒 河汗子弟 所乘骏马 斩首数百千级。自尔厥后，突厥丧胆，深服帝之能兵，收其所部，不敢南入。”^①

大业十三年，隋炀帝因李渊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突厥势力南下屡立战功，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。在太原留守任上，李渊鉴于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强烈冲击下大势已去。终于开始酝酿准备起兵反隋，夺取天下。与此同时，李渊的次子李世民自从随父亲来到太原后 见“隋祚已终”，为“潜图义举”^②，结交了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刘文静等一批豪友，图谋大事。

① 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卷上。

② 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。

三 晋阳起兵前后

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，策划了对历山飞农民起义的镇压，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，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；也有地方贵族、豪强势力趁机起兵占据州县，割据一方。据《新唐书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：

刘武周起马邑，林士弘起豫章，刘元进起晋安，皆称皇帝；朱粲起南阳，号楚帝；李子通起海陵，号楚王；邵江海据岐州，号新平王；薛举起金城，号西秦霸王；郭子和起榆林，号永乐王；窦建德起河间，号长乐王；汪须拔起恒、定，号漫天王；汪华起新安，杜伏威起淮南，皆号吴王；李密起巩，号魏公；王德仁起邺，号太公；左才相起齐郡，号博山公；罗艺据幽州，左难当据泾，冯盎据高、罗，皆号总管；梁师都据朔方，号大丞相；孟海公据曹州，号录事；周文举据淮阳，号柳叶军；高开道据北平，张长_恐据五原，周洮据上洛，杨士林据山南，徐圆朗据兖州，杨仲达据豫州，张善相据伊、汝，王要汉据汴州，时德叟据尉氏，李义_湍据平陵，慕容顺据青、莱，淳于难据文登，徐师顺据任城，蒋弘度据东海，王薄据齐郡，蒋善和据郓州，田留安据章丘，张青特据济北，臧君相据海州，殷恭遂据舒州，周法明据永安，苗海潮据永嘉，梅知岩据宣城，邓文通据广州，狸酋杨世略据循、潮，冉安昌据巴东，宁长真据郁林，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。

上述记载表明，待到隋大业十三年，反隋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国大地，隋王朝的命运已是危在旦夕了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，李渊的起兵反隋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。

在官修的史书如新旧《唐书》以及《资治通鉴》中为了有意地突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，说什么晋阳起兵本非李渊的本意；“皆秦王世民之谋”^①，“皆太宗之功”。大量记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。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，起兵反隋的念头在李渊的脑海中可谓是由来已久：

大业九年，李渊于怀远镇为隋炀帝东征高丽督运粮草，与宇文士及“往在涿郡，尝夜中密论时事”^①，后来宇文士及投降唐朝，李渊又对裴寂说：“此人（指宇文士及）与我言天下事，至今已六七年矣，公辈皆在其后”。当时，二人的“密论时事”、“言天下事”无疑是图谋天下之类的密事。

与此同时，李渊按夫人窦氏生前的建议，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及炀帝对他表示不满后的“纵酒纳贿以自晦”，无疑是为着掩盖自己谋取天下的意图，保存自身，以观时变，寻找机会。

李渊调任弘化郡留守，兼领关右十三郡军事，他的妻兄窦抗前来劝说他“可乘其便，天之所启也。”^②李渊告诫窦抗不要乱讲，认为“为祸始不祥”。这表明他一直在考虑起兵一事，但不愿在时机成熟前采取行动，以免招来祸难。

大业十一年，李渊调任山西，今太行山以西，河东，今山西省西南部，慰抚大使，他推荐好友夏侯端任副使。这位颇知“玄象”的夏侯端向李渊劝说：“金玉床摇动，此帝座不安。……天下方乱，能安之者，其在明公。……若早为计，则应天福；不然者，则诛矣。”^③李渊“深然其言”表明李渊已下定了起兵的决心。

^① 《旧唐书·宇文士及传》。

^② 《旧唐书·窦抗传》。

^③ 《旧唐书·夏侯端传》。

大业十二年，据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记载，李渊来到太原任职时，曾对李世民说：“唐固吾国，太原即其地焉。今我来斯，是为天与，与而不起，祸将斯及。”这是李渊来到太原后已决心起兵反隋的又一证明。

同年十二月，李渊升任太原留守，突厥入侵北部边境，隋炀帝命令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抵抗。因战事不利，炀帝派使者执李渊和王仁恭送江都治罪。李渊托辞不赴江都，同时对李世民说道：“隋历将尽，吾家继膺符命，不早起兵者，顾尔兄弟未集耳。今遭姜里之厄，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，不得同受孥戮，家破身亡，为英雄所笑。”^①

李世民一直积极主张起兵反隋，见炀帝要逮捕父亲问罪，便主张举兵造反。几天过后，炀帝又派使者赦免了李渊的罪过。这场虚惊对李渊起兵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，他通知建成、元吉于河东“潜结英杰”使世民“于晋阳密招豪友”^②。

从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至大业十三年五月的半年期间，李渊父子加快了起兵准备的步伐。

在李世民“密招豪友”的过程中，刘文静、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刘文静字肇仁，据《旧唐书·刘文静传》记载，此人“伟姿仪，有器干，倜傥多权略。隋末，为晋阳令，遇裴寂为晋阳宫监，因而结交。”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，文静通过一段观察后认为李渊“有四方之志，深自结托。”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观察，认为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，因而对裴寂说李世民“非常人也。大度类于汉高，神武同于魏祖，其年虽少，乃天纵矣。”后来，刘文静因与瓦岗农民起

^② 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卷一。

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，被隋炀帝下令投入太原狱中。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同图谋大事的人才，便私下到狱中探望他。刘文静心中明白李世民为何而来，便十分高兴地向他说道：

“天下大乱，非有汤、武、高、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”^①

李世民回答说：

“卿安无知，但恐常人不能别耳。今人禁所相看，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。时事如此，故来与君图举大计，请善筹其事。”^②

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，图谋大事，便胸有成竹地谈出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，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。他说：

“今李密长围洛邑，主上流播淮南，大贼连州郡，小盗阻山泽者，万数矣，但须真主驱驾取之。诚能应天顺人，举旗大呼，则四海不足定也。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，皆入此城。文静为令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朝啸聚，可得十万人，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，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，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盈半岁，帝业可成。”^③

李世民听罢刘文静的三通高论，笑着说：“君言正合人意。”^④然而，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布署，尚不十分清楚，更不必说刘文静了。世民与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及早起兵，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项。

裴寂字玄真，据《旧唐书·裴寂传》记载，此人“年十四，补州主簿。及长，疏眉目，伟姿容。”在长安任侍御史、驾部承务郎期间，与李渊已有结识交往。李渊来太原任职，裴寂此时正担任晋阳宫副监。李渊因“与寂有旧，时加亲礼，每延之宴语，间以博奕，至于通

③④ 《旧唐书·刘文静传》。

宵连日，情忘厌倦。”^①

此时李世民急于及早起兵反隋，但又不敢贸然向父亲进言。他见到裴寂很受父亲的器重，便决定与裴寂结成密切的关系，通过裴寂劝说父亲及早起兵。为此，李世民投裴寂所好，私下出钱数百万，使令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，故意输钱给裴寂。裴寂赢钱既多，十分高兴，每日同世民游乐。世民既已与裴寂结成亲密关系，便把敦促父亲及早起兵的实情告放裴寂，裴寂答应从中相助。一日，裴寂使令晋阳离宫中的两名美女在家中酒宴时侍奉李渊饮酒，饮至半醉之时，裴寂乘机向李渊说：

“二叟（即李世民）密缿兵马，欲举义旗，正因寂以宫人奉侍，公恐事发及诛^②，急为此耳。今天下大乱，城门之外，皆是盗贼。若守小节，旦夕死亡；若举义兵，必得天位。众情已协，公意如何？”李渊见形势既已如此，便对裴寂说道：

“我儿诚有此计，既已定矣，可从之。”

李渊起兵的想法由来已久，为谨慎从事，他只是偶而向李世民透露这一意图，从未谈及行动布置，更没有向外人透露。此次李渊当着裴寂的面明确就起兵一事表态，表明起兵反隋一事已由谋划进入付诸实施的阶段，起兵的步伐从此被加速进行。

李世民与刘文静、裴寂一道敦促李渊及早起兵，《旧唐书·刘文静传》亦记载道：当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，李世民派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向李渊进言说：

“《易》称‘知几其神乎’，今大乱已作，公处嫌疑之地，当不赏之功，何以图全？其裨将败衅，以罪见归。事诚迫矣，当须为计。晋

^① 《旧唐书·裴寂传》。

以皇帝离宫中的美女侍宴，当事人当然是罪不容诛。

阳之地，士马精强，宫监之中，府库盈积。以兹举事，可立大功。关中天府，代王冲幼。权豪并起，未有适从。愿公兴兵西入，以图大事，何乃受单使之囚乎？”

李渊深以为然。

据《资治通鉴·卷一八三》记载，在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，世民“乘间屏人说渊曰”：

“今主上无道，百姓困穷，晋阳城外皆为战场；大人若守小节，下有寇盗，上有严刑，危亡无日。不若顺民心，兴义兵，转祸为福，此天授之时也。”

李渊闻听后表示大为惊讶，说道：

“汝安得为此言，吾今执汝以告县官！”

说着，李渊便取过纸笔，想要写表状向县官告发儿子。李世民心中有数，并不相信父亲真会向官府告发自己，不过是责怪自己如此大事怎可随意轻言而已。于是，世民用缓和的语气向父亲诚恳地说道：

“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，故敢发言，必欲执告，不敢辞死！”

李渊见儿子信以为真，便马上改口说：

“吾岂忍告汝，汝慎勿出口！”

第二天，李世民又向父亲劝说道：

“今盗贼日繁，遍于天下。大人受诏讨罪，贼可尽乎？要之，终不免罪。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讫，故李金才无罪，一朝族灭。大人设能尽贼，功高不赏，身益危矣。唯昨日之言，可以救祸，此万全之策也，愿大人勿疑。”

李渊闻言后感叹说：

“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，化家为国亦由汝矣。”

为起兵必须扩充兵力，而公开招募士兵必定遭到炀帝委派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高君雅、王威的警觉，暴露起兵的密谋。为此，李渊使令世民与刘文静商量办法。结果，刘文静以晋阳令的身份诈称接到皇帝诏书：“发太原、西河、雁门、马邑男子二十至五十悉为兵，期岁尽集涿郡以伐辽。”消息传出后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对炀帝决定再次征伐辽东愤怒无比。为躲避服征辽的兵役，人们纷纷投到李渊的部下当兵。

与此同时，马邑人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，占据马邑郡，起兵反隋，自称皇帝，同时勾结匈奴率兵南攻，攻陷楼烦，占据汾阳宫（隋炀帝的离宫）。这件事，又为李渊的公开募兵找到了有利的借口。

为了麻痹和稳住高君雅、王威，李渊故意对二人说：“武周据汾阳宫，吾辈不能制，罪当族灭，若之何？”高、王二人闻言后很是恐惧，向李渊请计，李渊故意说：

“朝廷用兵，动止皆禀节度。今贼在数百里内，江都在三千里外，加以道路险要，复有他贼据之……进退维谷，何为而可？”

王威等人不明白李渊说这番话的用意，中了李渊的计策，说道：

“公地兼亲贤，同国休戚，若俟奏报，岂及事机，要在平贼，专之可也。”^①

李渊故意装作不得已而听王威的建议，说道：

“如此看来，只好首先招募士兵了。”

于是，李渊命李世民与刘文静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窦琼等人四出招募士兵，远近有不少前来投奔，旬日之间便募兵近万人，由刘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三。

文静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窦琮等人统领。同时李渊秘密派往河东（永济蒲州镇）长安，令建成、元吉以及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。

长孙顺德、刘弘基都是为了逃避征伐辽东诏令而亡命于太原，窦琮也是触犯隋朝法律的逃犯。高君雅、王威见李渊非但不法办上述三人，反而令他们四出募兵，并委以带兵的重任。同时李渊又令王威兼任太原郡丞，令高君雅守备高阳，使令王、高二人不能过问军中的重要事务。当李渊招募的士兵云集晋阳时，高君雅、王威这才明白了李渊募兵的意图，怀疑李渊心怀异志，因而对行军司铠武士彘说：“顺德、弘基都是逃避征伐辽东的罪犯，罪当处死，怎能让他们这样的人统率士兵！”苏、王二人哪里知道武士彘与李渊私交甚深，早已了解李渊起兵的意图，因而袒护李渊说：“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门客，如果就此事责难唐公，必将引起大的纠纷。”王威因此没有责问李渊。留守司兵田德平见李渊大量募兵，想要劝说王威等人追查募兵一事。武士彘闻知后，对田德平说：“讨捕盗贼的军队，全部归唐公统领，王威、高君雅不过是托寄于客位而已，地位很不稳固，他们能有什么作为！”田德平闻听此言，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。

李渊父子大量募兵的事实，毕竟难以掩盖其真正的意图。高君雅、王威被剥夺了参预军机要务的大权，越发感到形势不妙，便拉拢晋阳乡长刘文龙等人，谋划利用在晋祠求雨的机会，将李渊父子及其一伙人全部杀死。刘文龙平素与高君雅、王威友好，后来通过裴寂的关系与李渊相识。李渊平时待人以礼，不问出身高下，使刘文龙很受感动。因而当高、王指使文龙谋杀李渊父子时，文龙便把这一密谋全部告诉李渊。李渊得知高、王二人的密谋，大为惊讶。于是，他使令刘文龙继续与高、王二人保持密切的交往，以便随时掌握高、王的一言一行，同时立即布置铲除高、王二人的行动。

计划。

大业十三年五月癸亥夜，李渊命长孙顺德、赵文恪等人从兴国寺新军中挑选 500 名壮士，会同李世民率领的精兵埋伏在晋阳宫城东门的左面，加强戒备。同时，使令鹰扬府司马刘政会“为急变之书”到留守府的议事大厅控告高、王二人勾结突厥谋反，以便就地逮捕二人。

第二天五月甲子日早上，李渊与副留守高君雅、王威二人在留守府大厅议事，刘文静引导刘政会入厅，只见政会大声说道：

“有密状知人欲反！”

李渊目视王威等人，令其取告密状审视。刘政会不肯将告密状交给王威，说道：

“所告乃副留守事，唯唐公得视之！”

李渊故作惊讶地说：“怎会有这等事情！”说着，取过告密状观看，只见状纸上面写道：

“威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。”

这时，高君雅已经从突如其来的诬告中发觉已陷入李渊等人的预谋，因而挥臂大骂道：

“这是造反的人想要杀我而已！”

然而，高、王二人此时的觉悟已经为时过晚。当时，李世民的军队已把守住城内的街道路口，刘文静与刘弘基、长孙顺德等人一道将王威、高君雅逮捕入狱。

事情也真是有些巧合，高、王被捕入狱的第三天，突厥数万人果然入寇晋阳，轻骑入外郭北门，出其东门。李渊命裴寂等人布置军队，防备敌军入城。与此同时，李渊下令将所有城门洞开，突厥不知李渊用的什么计策，不敢入城。因此，城中的军民都认为突厥骑兵果然是高君雅、王威二副留守密谋召来的，于是将高、王二人

斩首。

逮捕并处死副留守高君雅、王威，标志着李渊父子晋阳起兵的正式开始。

有关晋阳起兵的大量记载表明，无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起到了怎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起兵的主持人应是李渊，正史中所谓晋阳起兵“皆世民之谋”的说法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。李渊早有起兵之心，事实上一直为此从各方面做出准备。然而，做为一方的军政大员，他老成持重，深知此等大事不可轻率地鲁莽从事。他深知此举的成功要具备各方面的条件，要等待时机的成熟。在隋王朝尚有一定实力、隋炀帝对臣下百般戒备的情况下，他不愿重蹈杨玄感的覆辙，将起兵之心埋藏在心中，甚至对亲生儿子李世民也不肯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。事实表明，李渊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。在晋阳起兵中，李渊绝非是缺乏足够的勇气，处于被动的地位。更不是无能之辈。在当时的环境之下，他的坚忍镇静，正是体现了他的四方之志、大智大勇。事实表明，当几支主要的义军势力足以置隋王朝于死地的情况下，他在起兵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，确实是做到了把握时机，准备周密而充分，故能一举而成功。正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·卷二十》中所评论的那样：

“人谓唐之有天下也，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，不知高祖慎重之心 持之固 养之深，……非秦王之所可及也。”

“高祖犹慎之又慎 迟回而不迫起 故秦王之阴结豪杰 高祖不知也。非不知也，秦王勇于有为，而高祖坚忍自持，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。”

不容否认，李世民在协助、敦促李渊的晋阳起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如果说李渊在晋阳起兵中慎重有余的话，那么，他的次子世民则是勇于有为，擅长计谋，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准确，又